

“有惊无险： 我在贝宁被绑架” ——石沂东参赞的故事

本刊记者 葛 军



石沂东摄于贝宁

贝宁,位于西非中南部,南濒大西洋,首都科托努。1964年11月12日中国与贝宁建立外交关系。1966年1月,贝宁单方面宣布终止两国关系,同年与台湾当局“复交”。1972年中贝两国恢复外交关系。

中国驻外使馆按所在国的生活条件被分为六类,类别越高说明工作生活条件越艰苦。中国驻贝宁使馆属于四类地区。

石沂东,女,中国驻贝宁大使馆政务参赞,58岁。2002年通过外交部公开竞争上岗,成为第一批竞争上岗的参赞之一。一般情况下,外交部不会向四类地区的使馆派遣这一年龄段的女同志。

其实,要不是这次突发事件,贝宁的中国使馆不会引起我们的关注,因为这样的使馆还有不少,比那里条件艰苦的使馆也有;像石沂东这样的外交官也还有不少。在采访中,石沂东反复跟我说,我个人没什么可写的,要写就写写常年工作在非洲的中国外交官。

假警车拦住了奔驰车

今年的7月18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。外交官们照例要忙碌

地处理各种外交事务。这一天恰巧外交部行政司考察组结束在贝宁的考察工作,准备回国。因科托努没有国际机场,所以石沂东要将考察组成员送到邻国多哥乘机。从中国使馆到贝宁、多哥边界走国家一号公路,单程需要近两个小时。将他们一行人顺利送过边界后,石沂东他们原路返回,当时她看了一下表,时间是下午五点零一分。

一辆面包车带着使馆其他人员行驶在前,石沂东乘坐一辆奔驰车行驶在后,司机是使馆雇佣的一个当地黑人。

行驶到一半路程,前方的面包车渐渐远离了石沂东的视线。这时,一辆警车从他们的后方驶来,并斜插上来,示意他们迅速停车。石沂东回忆说,当时她清晰地看见,那确实是一辆带有警车标志的崭新的吉普车。他们正常行驶,没有违反交通规则,警察没有理由随便拦截他们,更何况他们的车还是外交牌照的。

尽管当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,石沂东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异常。然而当他们的车试图继续前行,那辆警车加快速度,竟然横着停在了奔驰车前。接着,从车上迅速跳下来

三个彪形大汉,转眼来到了奔驰车前。石沂东精通法语,并不担心向警察说明她的身份和事情的缘由。于是她没有任何防范地将车窗摇下了一半,想跟迎面走来的人问个究竟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意外发生了。

一个大汉瞬间掏出了一瓶喷雾剂,透过半开着的车窗,朝石沂东的眼睛猛喷过来。石沂东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,并用双手捂住了脸。她常年有眼压高的毛病,即便是平常的日子里,也要靠药物维持着,这一喷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就在这一瞬间,司机已经被他们拖下了车,一个大汉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,另一个坐到了她身边。石沂东试图说明她的身份,就伸手去够车座后靠背上的手提包。

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她身旁的大汉再次拿出喷雾剂,往她的脸上和身上喷去,并勒令她:“不许说话,不许动!”石沂东意识到她遇到的是开着假警车的假警察。她一边忍着眼睛和身上火辣辣的疼痛,一边用法语大声地说:“我是中国的外交官,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。”大汉听到她的喊叫,不仅没有住手,反而粗暴地一把撕开她的裙

袍的领口,肆无忌惮地朝她的前胸猛喷一阵,随后又狠狠地将她的头按下,命令说:“不许抬头,不许睁眼!”石沂东感到阵阵窒息,知道这种情况下反抗也是无济于事的,就决定见机行事。当脸上和身上的酸疼稍微减轻些,她才发觉腰间有一个硬硬的东西顶着她,她意识到那是一把枪。

事发地点距首都科托努市还有 30 公里的路程。

化险为夷

情况要比她想像得复杂得多。一阵颠簸之后,车子停了下来,石沂东注意到周围荒芜一片,求助的希望非常渺茫。还没等三个大汉开口,石沂东就说:“我是中国使馆的政务参赞,刚刚将我们的一个代表团送走,现在返馆。今天晚上,我们将在大使官邸宴请你们总统府军事办公室主任、中央警察局局长及宪兵队负责人。”听了她这番话,三个匪徒一改先前的慌乱和紧张,镇静了许多。他们低声嘀咕了好一阵后,厉声问到:“油箱里还有多少油,后备箱里还有油吗?”石沂东说:“我不会开车,我不知道。我是

外交官,是来做友好工作的,你们的友谊体育场、会议大厦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,30 多年来我们一直派来医疗队。”一个大汉粗暴地打断她的话:“少废话!你有枪吗?”石沂东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是来做友好工作的,还用得着枪吗?”然而大汉却恶狠狠地喊到:“下车,就地趴下,闭上眼睛。”石沂东并没有趴下,她想,堂堂的外交官不能趴下,他们想干嘛就随他们吧,大不了一死。然而,结果却出乎她的预料:伴随着发动机的阵阵轰鸣声,汽车扬起一路尘土,飞快地开走了。

石沂东顾不上掸净身上的尘土,也顾不上已经开始肿痛的眼睛和前胸,只有一个想法——求生。她顺着奔驰车的车辙,穿过荒地和一片丛林,一直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。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答应把她送回使馆。

当他们驶上公路不久,就遇见了正在路边焦急等待着她的使馆同志们。石沂东顾不上去医院检查伤痛,回到使馆简单洗洗澡,就又打起精神去参加活动了。


以非洲司开始,以非洲司结束

贝宁被誉为“西方民主的橱窗”,治安状况一直良好,类似事件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。但近期整体治安状况不尽人意,事发前的一个月有一名德国商人被害,随身携带的巨款被洗劫一空;四天前,中国专家组成员也有过一次类似有惊无险的经历。

然而,对这些外交官工作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案件。对他们威胁最大的首先是非洲疟疾。疟疾是靠蚊子的叮咬得以传播的。一旦被带有这种病毒的蚊子叮咬后,人体里就终身带有这种病毒,它们寄生在血液里和肝脏周围。当抵抗力下降时,病毒就会发作,这就是俗话说的“打摆子”。在贝宁“打摆子”的 98.9% 都是患上了恶性疟疾。去年有一名中国医疗队员就死于恶性疟疾。

除此之外,近年来在驻非洲的长年外交官中还发现了普遍的高血压患者。这些人既没有高血压家族史,也没有任何不良生活习惯,但却有明显的高血压症状。而且奇怪的是,这些症状会在离开非洲后的一段时间自行消失。在使馆这一群体被戏称为“老高委员会”。从 70 年代至今,中国向贝宁共派出了 17 批医疗队,每批都会有两三人患上高血压症。

石沂东的丈夫在科技部任职,本来他们准备退休前一同到法国工作,但石沂东却选择了现在的职位。她的逻辑是:要为她非洲司的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1972 年 12 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后,石沂东被分配到外交部非洲司,1973 年 1 月被派往扎伊尔(现称刚果[金]),参加建馆初期的工作,1978 年回国。转眼近 30 年过去了,这期间她先后在法国、比利时等国工作过,每次卸任后都回到非洲司。退休的年龄日益临近,恰逢外交部征聘,于是她就选择了贝宁作为自己外交生涯的终点站。

采访即将结束时,石沂东又重复了那句话:“其实我不想说这些事,我个人也没什么可写的,要写就写写那些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外交官们吧!”外交官的群体不都是由这样一个个体构成的嘛! 



1976 年毛泽东主席去世。石沂东接待时任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前来中国使馆吊唁。